

资本逻辑与社会契约的博弈

——对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

谢 静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基于对新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主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能够清晰揭示资本逻辑如何将自身的积累危机转化为对战后普遍性社会契约的系统性拆解。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国家干预的根本否定,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与风险推向个体,制造了风险的私有化;保守主义将结构性贫困解释为个体的道德缺陷,从而使福利走向带有惩罚性的条件化规训;“第三条道路”借用“社会投资”的修辞,要求劳动者成为“自我企业家”,完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全面商品化与治理化;右翼民粹主义则利用身份政治,将内部匮乏转化为族群间的资源争夺,构建了排他性的“福利沙文主义”保障模式。这四种思潮共同构成了一个以话语更新掩盖结构延续的闭环,将福利国家推向条件化、惩罚性与排外化的境地,并最终使其陷入严重的制度性瘫痪。这一危机不仅是资本积累逻辑与民主合法性之间结构性冲突的体现,更是一场将“人”降格为“市场要素”的异化危机。危机的深层逻辑不仅反映出西方社会治理范式的困境,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至上”,坚持“人民至上”,探索新型包容性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深刻的负面镜鉴与理论参照。

[关键词] 福利国家;资本逻辑;意识形态批判;结构性矛盾;社会契约

[中图分类号] F093;F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6)03-0028-09

尽管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契约的核心部分曾长期享有广泛且稳固的公众支持,但在其制度内部,围绕着“应由谁为其付费”以及“谁应从中获益”的分配正义问题,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政治冲突与利益博弈。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历史与结构维度加以审视,就会发现,福利国家的兴衰绝非单纯取决于经济周期或财政收支,更是一场深刻的观念竞争与阶级力量重塑的过程。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持续性危机,其本质在于“社会权利的普遍性承诺”与“资本积累的市场化逻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系统性冲突。在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浪潮高涨、福利体制加速分化的当下,厘清这一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不再只是西方政治社会学的内部议题,更有着深刻的全球性参照意义。

由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资本逻辑究竟是如何将自身的积累危机,转化为对战后普遍性社会契约的系统性拆解的?这一拆解过程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这一问题不仅是理论性的,更具有现实紧迫性:只有穿透意识形态的话语迷雾,才能真正理解当代福利国家从“社会保护”滑向“惩罚性管控”的深层驱动逻辑。新自由主义的风险私有化制造了深重的社会不安全感,而保守主义随即以道德话语将这种不安全感重新解释为个体失范的结果;当道德规训的合法性也开

[收稿日期] 2026-04-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KS193)

[作者简介] 谢 静(1979—),女,江苏盱眙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始动摇,“第三条道路”便以“社会投资”的进步修辞完成了对商品化逻辑的内部吸纳;而当这种精英化的中间路线彻底疏离了工人阶级,右翼民粹主义便以身份保护的名义,将资本积累危机造成的内部匮乏转化为族群之间的资源争夺。资本逻辑在每一次转折中都换了一副面孔,但每一副面孔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卸载国家对社会再生产的责任。

本文试图达到以下目标:其一,超越既有的对某种单一思潮研究,将多种意识形态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其共同构成了一个将福利国家推向条件化、惩罚性与排外化的“结构性意识形态场域”的观点;其二,借助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的“双重束缚”、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术及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赤裸生命”等批判理论工具,对各思潮的深层阶级逻辑与权力效果进行把握;其三,提出一个超越“经济-财政危机”叙事的核心命题,指出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与民主合法性之间结构性冲突的集中体现,也是西方社会治理范式在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趋于穷尽的历史性症候。

一、资本的进攻与回撤:风险的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不仅在于经济学视角的简单转换,更是一场旨在彻底颠覆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的观念剧变。这种批判从早期学术边缘的理论预演,演变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重塑西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工具。在这里,它通过对国家干预的根本性否定,开启了福利国家向市场导向转型的“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①

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建立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固有危险的深刻警惕之上。这一思想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20世纪30年代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的挑战。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指出,现代国家既不具备处理复杂经济决策的充分信息,也缺乏有效控制市场的管理能力。他认为,任何试图通过国家计划来替代市场自发秩序的尝试都注定失败。在这种缺陷下,政府为实现预期目标而不断强化的纠正措施,最终会演变成一种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权力扩张,从而剥夺个人的自由,这便是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虽然摒弃了极端的自由放任,主张国家权力应在法治的严格规约下行使,但他对扩张性财政政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政府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不仅是经济失策,更会侵蚀个体的经济自主权,从而系统性地压制个人主义、自由意识与社会的创新精神。他认为,社会福祉的增长应当建立在保护少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减轻税收监管负担的基础上,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惠及大众。而继哈耶克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进一步阐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不可分割性。他警告称,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个人的经济选择权被削弱,政治自由也必将面临萎缩。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学术界虽一度边缘化,但通过不断的组织化建设和精英动员,为日后的政治实践储备了理论势能。

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认知层面的复兴。依托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以及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CPS)等资金充足的智库,新自由主义思想被战略性地包装并推销给决策者。如果说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① 雅各布·黑克(Jacob Hacker)提出的“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是指美国社会政策中发生的微妙且渐进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风险保障的责任从政府或雇主转移到了个人身上(通常通过私人市场),这显著增加了中产阶级的经济不安全感。这一主题在其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巨大的风险转移》(The Great Risk Shift)和《赢家通吃的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中占据核心地位。

提供了理论蓝图,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动荡则为新自由主义从书斋走向政坛提供了历史契机。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的上台,标志着第一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福利紧缩政策的届至。对于福利国家,他们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改革,政府将“释放市场”的目标置于社会规划之上,明确将“平等”与“分配正义”的价值取向剥离开来。新自由主义对政府赤字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严厉指责,本质上是试图打破二战后的阶级妥协。当哈耶克主张社会福祉应建立在保护企业家精神和减轻税收监管的基础上时,其隐秘的逻辑是通过拆解福利国家的保护机制,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与风险彻底推向个体,从而在经济滞胀期实现资本利润率的重新拉升。弗里德曼进一步将政治自由与纯粹的市场选择权绑定,为日后将社会风险私有化提供合法性叙事。

要深刻理解这一时期的危机,就必须引入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观点。奥菲指出,所谓民主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实际上被置于一种无间境地。^①它在逻辑上既要履行“积累功能”,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又要履行“合法化功能”,通过去商品化的福利供给来回应社会群体的诉求,从而购买劳动力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在这种双重约束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矛盾已经不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直接对立,而是其积累功能与合法化功能、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系统性对立。后期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试图同时协调这两种相互竞争的需求时,陷入了常态化的“危机管理之危机”,即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在试图协调资本积累与民主合法性时,其干预手段本身却成了危机的来源。^②撒切尔和里根的上台,正是针对这一双重困境作出的资本主义维度内的回应。

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利国家被视为追求错误目标而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制度形态。这场被雅各·黑克(Jacob Hacker)表述为“静悄悄的革命”的新自由主义变革,实际上是一场暴力的“风险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risk)过程。而从奥菲的理论视角,更能清晰地看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试图单方面取消“双重约束”中的契约维度与合法化要求。通过将贫困的成因重新界定为个人行为而非结构性不公,新自由主义不仅削减了社会支出,更在深层逻辑上剥离了国家通过福利供给来维系民主合法性的义务。它试图打破国家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撕裂”状态,将国家从阶级妥协的缓冲器,彻底还原成资本积累的纯粹服务机构。然而,正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警示的那样,这种试图抹除民主合法性、将社会风险彻底推向市场的做法,虽然短期内缓解了国家的财政与积累危机,却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底层的结构性不稳定,为后续更深层次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③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这种单纯依赖市场方案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社会成本,再次成为学术界审视的焦点。

二、资本的道德规训:福利的条件化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者是从外部的经济效率与财产自由角度,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视为必须被摧毁的公敌;那么传统保守派的批判,则是从内部通过重塑社会价值观与道德约束力,对社会契约进行深层的结构性破坏。在保守主义的透镜下,福利国家的危机不仅表现为国家财政负担的加重,更被渲染为一种深刻的道德风险与社会秩序的崩塌。保守派,尤其是欧洲基督教民主派,最初

^① Jens Borchert & Stephan Lessenich, *Claus Offe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Routledge, 2016, pp. 27-29.

^② 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MIT Press, 1984, pp. 67-73.

^③ 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St. Martin's Press, 1973, pp. 249-255.

曾将福利国家视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动荡、增强公民政治归属感的“安全阀”。然而,随着福利体制的扩张与资本积累危机的加深,保守派借助于“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与“新家长主义”(new paternalism)的逻辑,成功地将福利制度从一项普遍的社会权利,扭转为规训与惩罚底层个体的教化工具。

保守派批判的隐秘逻辑在于,将资本主义体系自身产生的结构性贫困,如去工业化与资本转移导致的失业,巧妙地转化成个体的道德缺陷与文化病理。保守派认为社会在道德上先于个人存在,并指责福利国家过度的强制性与集权化挤压了公民社会及私营部门的空间,导致社会伦理受到侵蚀。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对于“福利依赖”的指责是这一维度的典型代表。他声称福利金的发放并未缓解贫困,反而通过改变贫困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动机,诱发了严重的代际依赖。在这种污名化视角下,贫困被剥离了其纯粹的经济与阶级剥削属性,被重新界定为一种病态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① 保守主义者借此宣称,不附带义务的“消极福利”破坏了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使受助者丧失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并日益与主流社会隔绝。这种论调的实质,是资本为了推卸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问题“道德化”。

面对这种被建构出来的依赖文化危机,以劳伦斯·米德(Lawrence Mead)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新家长主义”的政策议程,主张贫困的根源在于“贫困文化”及其导致的行为失范。^② 在这一话语体系下,国家被赋予了强制性的“家长”角色,通过加大对贫困者生活的干预,强制推行符合资本胃口的工作价值观和个人责任感。米德毫不讳言,“福利正在从补贴转变为一种制度……新出现的家长主义,以反政府言辞作掩护,其真正的议程则是国家建设”。^③ 个人为了集体必须牺牲部分自由并接受国家的监督与管理。这直接催生了旨在将福利与工作义务紧密挂钩的“劳务福利”(workfare)模式。其核心目标不仅是削减财政支出,更是通过强制性的制度暴力,迫使边缘化的受助者重返条件恶劣的劳动力市场,重新接受资本的剥削。1996年美国将“有受抚养子女的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重组为带有严格条件限制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便是这一样板的制度化的实践。该事件标志着福利已从单纯的资金补助,蜕变为一套为后工业社会重构资本整合纽带的行为修正系统。

这种将福利问题“道德化”与“行为化”的保守主义逻辑,迅速展现出其跨越国界的渗透性,甚至与重组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发生了深度融合。在英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撒切尔及梅杰政府皆受此影响,大肆推行福利条件化与契约式的就业促进项目;而后续的新工党议程也在“工作权”向“工作义务”转化的逻辑上与米德高度一致。即便是传统福利根基深厚的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挪威,也通过设置福利时限和强制执行惩罚措施,显著增强了福利制度底层的惩罚性色彩。通过欧盟(European Union, EU)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等国际机构的背书,“权利与责任重新连接”的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溢出。这深刻地证明了当资本积累的危机动摇了福利制度的根基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极易

^① 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Basic Books, 1984, p. 34.

^② “新家长主义”(New Paternalism)是一种通常源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路径。它旨在引导个人做出被认为符合其自身最佳利益的选择,且并不禁止其他选项。该方法利用“助推”(nudges)手段——如默认设置或信息框架——来对抗认知偏差(例如拖延、自控力不足),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其既定目标(如增加储蓄或更健康的饮食)。它与传统家长主义的区别在于:它试图根据个人自身(尽管有时是矛盾的)欲望来提升福祉,而非强加某种道德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仍存在削弱个体自主性的风险。

^③ Lawrence M. Mead, *Welfare Policy: The Administrative Frontier*,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15, No. 4, 1996, p. 589.

滑向更具威权和道德主义色彩的监管模式。保守主义批判不仅为大规模缩减社会支出提供了虚伪的道德依据,更在客观上重塑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责关系,将底层群体彻底“再无产阶级化”,从而为后续“第三条道路”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三、资本的內部吸纳:保障的投资化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兴起代表了左翼内部一场更为隐蔽的自我重构与范式转移。这一转向不仅是对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挑战的被动回应,更是一场旨在重新定义进步主义政治的范式转移。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可行。随着传统劳工阶层选民基础的萎缩,左翼政党面临着必须吸引中产阶级选民或被政治边缘化的抉择。从旧自由主义到新民主党(NPD),“第三条道路”作为政治标签,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民主党。克林顿试图在里根-布什时代的严苛路线与“伟大社会”时代^①所谓的“怜悯自由主义”(the “bleeding heart” liberalism)^②之间寻找中间地带,强调工作、责任与社区的重要性,以区别于旧有的社会自由主义。英国工党在经历了十八年的在野困境后,在布莱尔的带领下明确宣布“决不重蹈覆辙”,并主张现代政府的职能不再是预判市场,而是通过与自身历史划清界限来争取商界与中产阶级的支持。^③千禧年之交,这一立场发展为对传统福利制度的系统性批判。尽管各国实践存在差异,但其核心共识在于,传统的福利安排不仅在经济上难以为继,在道德上也因缺乏相互责任而不再值得追求。

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建构中,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借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概念,完成了对福利国家功能的根本性再定义,即国家不应再致力于将个人包裹在保护层中以免其免遭不安全因素的影响,而是应当鼓励个人接受风险并参与竞争。从福柯的治理术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标志着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化。福利不再是一项单向的公民权利,而是变成了以“责任”为前提的契约。国家从直接的“提供者”退位为“协调者”,将资源集中于教育、培训等供给侧的“社会投资”。这种模式的真正目的,并不只是单纯地要求劳动者具备应对市场的技能,而是要求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深度内化“终身学习”和“积极就业”的规范。在这种生命政治的逻辑下,劳动者被强制转化为自身人力资本的“自我企业家”(entrepreneur of the self),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投资与优化。生命的全部维度,包括时间、精力与心智都被统摄进了市场竞争的齿轮之中。

面对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挑战以及传统劳工选民的流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如英国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急剧向中右翼靠拢,试图在抛弃旧有社会自由主义的同时,重塑进步主义政治的合法性。然而,透过当代生命政治的批判视域可以发现,“第三条道路”所倡导的从“被动救助”向“投资型福利”的转向,实质上是对个体生命活动的全面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为了掩盖这种将生命彻底商品化的残酷实质,“第三条道路”巧妙地借用了社会正义的修辞。它将社会正义重新诠

① “伟大社会”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旨在通过在教育、医疗保健、民权及城市发展方面实施大规模的联邦项目,消除贫困和种族不公。该议程在“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对美国社会福利体系及政府在社会问题中的角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成就包括《民权法案》《投票权法案》以及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的建立,关于其长期有效性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

②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普遍认为,一个聚焦于个人自由的议程将最大程度地造福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和社会中的不利群体。

③ Matthew Watson & Colin Hay,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sation and the Logic of No Alternative: Rendering the Contingent Necessar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Labour*, Policy and Politics, Vol. 31, No. 3, 2003, p. 297.

释为“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以取代传统的“结果平等”,声称其目标是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参与市场运作中。吉登斯将其美化为“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宣称这是帮助人们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适应和成功,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那种直接的排斥。

然而,这种正义修辞掩盖了其深层的强制性与惩罚性。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尖锐指出的,“第三条道路”方案缺乏真正的自由观念,反而融合了市场自由主义与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家长制,带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①它通过惩罚性措施强制推行“劳动义务”。在此,我们可以借用阿甘本的视域来理解,那些无法将自身成功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本”或者拒绝顺从这种积极就业规范的弱势群体,不仅会被剥夺福利支持,更会被这种“福利转向就业”的惩罚性机制直接抛弃在全球市场的变幻莫测之中。在“包容”的虚伪口号下,他们被剥夺了社会权利保障,沦为直面市场暴力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而彻底暴露了“第三条道路”兼具市场剥削与道德规训的双重暴力本质。

四、资本危机的身份防御:保障的排他化

在20世纪8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曾是市场化政策的坚定拥趸。然而,随着90年代全球化与去工业化将低技能工人粗暴地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中,加之传统社会民主党向中产阶级与“社会投资”政策妥协,右翼民粹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底层的政治真空。为了扩大选民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立场完成了一次从新自由主义向“中间保护主义”的战略转型。通过承诺抵御移民竞争并强化对本国人的社会保护,他们成功收编了那些深感为时代所抛弃的工人阶级。

这种排他性理念随后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落地,并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一方面,该制度对内呈现出排他性的福利扩张。有研究显示,在包含右翼民粹政党的联合政府中,福利待遇反而不易被缩减。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他们甚至逆势扩大了家庭补助或降低了退休年龄,但这是一种仅针对“内部人”的特权扩张。另一方面,该制度对外则是筑起了制度化的隔离墙,通过设定语言能力、居住年限等隐性门槛,或直接出台歧视性政策,将“外部人”隔离在外。受各国历史传统影响,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合法成员”的界定也不尽相同。例如,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倾向于赋予所有法国公民(无论原籍)优先权;而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则诉诸更为严苛的标准,主张即使是获得国籍的移民,若无长期工作缴费记录也应被排除在外。

如今,右翼民粹主义福利政策的兴起为福利国家的讨论进一步引入了深刻的身份政治维度。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挑战福利国家的普遍性特征,主张一种基于民族认同的排他性保障模式,即“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而“福利沙文主义”的勃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排外情绪,其本质是福利国家固有的民族国家疆域属性与全球资本无限流动性之间矛盾的彻底激化。

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本质上从未真正实现过普遍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上的排他性特权共同体。其战后“黄金时代”的高福利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平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系统性剥夺。然而,随着全球化危机的加深和去工业化的蔓延,低技能工人直接暴露在残酷的市场风险之中。同时,许多福利体制由于长期忽视即时的收入保障工具,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显得脆弱不堪。当依靠剥削外围国家获取的“帝国红利”大幅缩减,福利国家无法再依靠经济增量来平息内部矛盾时,内部的资源争夺便迅速披上了身份政

^① Ralf Dahrendorf, *The Third Way and Liberty: An Authoritarian Streak in Europe's New Cen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1999, p. 13.

治的外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此完成了从支持新自由主义向中间保护主义的转型,试图通过呼应工人阶级的不安全感来扩大选民基础。他们将内部因资本剥削造成的匮乏,转化为民族内部与外部的资源争夺,认为普惠性的福利制度会将宝贵的社会资源从“应得的”本国人转移到“不应得的”移民手中。

在这种防御性的资本逻辑下,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运用了一种隐秘的种族主义逻辑,即通过将非我族类的劳动者界定为“不配得”的掠夺者,来掩盖资本主义体系根本无法提供普遍性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困境。为了将这种基于种族和身份的排他性理念付诸实践,他们在反歧视法律的框架内开发了一系列福利沙文主义政策工具。例如,在成员资格的界定上,不同国家的右翼力量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与“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的传统,设置了严苛的排他标准;在政策实施上,他们不仅利用语言能力、居住年限等间接条件设置隐性门槛,还推行直接的惩罚性措施,例如丹麦出台允许政府扣押难民资产的“珠宝法”,以及引入低于常规水平的“启动补助金”作为威慑手段。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排他性理念具有极强的跨国渗透力。为了应对选举威胁,许多主流左右翼政党也开始向排他性的福利模式滑落。

最终,福利沙文主义与选举民主中的“简化”逻辑形成了共谋。复杂的全球资本主义剥削与结构性不平等,被右翼民粹主义粗暴地压缩为“驱逐移民”或“捍卫本国福利”这样便于动员的政治口号。当“社会公正”被迫沦为一种排他性的防御话语时,福利国家不仅无法摆脱“以生产性补偿化解分配矛盾”的旧路径,更无法在资源耗竭与财政紧缩的缝隙中重塑社会公共资源的概念。通过划定森严的种族与国界壁垒,福利国家正在试图掩饰其无法调和资本积累与普遍社会权利之间矛盾的终极溃败,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更加严重的制度性瘫痪之中。

五、余论

通过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主要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发现,福利制度的演变绝非纯粹的功能性调适或应对财政周期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由资本逻辑主导、通过观念竞争与阶级力量重塑来系统性解构普遍社会契约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昔日蛰伏于边缘的理论思潮被悉数转化为试图重构体制的观念武器。它们不仅在学术界引发激辩,更在资金雄厚的智库、政治代理人及国际组织的推波助澜下,实现了从理论主张向跨国政策的实质性转化。而曾试图调和资本积累与普遍社会权利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最终被证明只是资本主义长周期均衡中的一段脆弱插曲。进入当代,市场正统观念已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占据压倒性优势,它将传统的“结果平等”彻底降格为依附于市场参与的“社会包容”。然而,这种基于市场逻辑的制度重组必然走向其自身的反面。随着福利供给日益演变为附加严苛条件的惩罚性机制,公民被剥夺了制度保护,直接暴露在全球市场的变幻莫测之中。这种倒退不仅无力修复后工业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痼疾,反而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焦虑,从而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土壤。最终,当经济危机再次袭来时,资本主义体制内涌现出的不再是对社会团结的普遍共识,而是更加激进的排他性“福利沙文主义”与针对弱势群体的系统性道德惩罚。

本文无意重申“资本积累与民主合法性存在结构性冲突”这一既有判断,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这四种意识形态之间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具有内在的历史更迭逻辑,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都是在前一种话语的合法性危机中被资本逻辑所征用,共同构成一个“以话语更新掩盖结构延续”的动态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使福利国家的危机呈现出顽固的结构性而非偶发性特征。而当这一“意识形态闭环”自身也走向结构性耗竭时,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逻辑开始在西方社会内部浮

现,即右翼加速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右翼民粹主义试图通过重构福利体制来延续资本秩序的策略不同,右翼加速主义者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修复性”政治。他们吸收了尼克·兰德(Nick Land)的“资本加速”理论,主张现有的自由民主体制与福利国家已然腐烂至无可救药,唯有主动加速致其崩溃,才能冲破现代性的制度桎梏,在废墟之上重建新秩序。这一逻辑的极端之处在于,它将福利国家的制度性瘫痪不再视为需要被克服的危机,而是视为需要被加速推进的历史契机。

右翼加速主义具有深刻的症候性意义。它的兴起恰恰印证了这四种意识形态对普遍性社会契约的轮番拆解,并未带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重组,而是不断加深其合法性危机,并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推入无法被现有制度容纳的“剩余人口”境地。当被剥夺了制度保护的群体的愤怒既无法被改良主义消解,又被右翼民粹主义以身份政治加以导引时,激进的制度虚无主义便获得了滋生的温床。在这个意义上,右翼加速主义不是加剧福利国家危机的外部冲击,而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逻辑自我极化的内生产物。它以最粗暴的方式,宣告了试图在资本逻辑内部修补社会契约的所有努力的彻底失败。这不仅标志着西方社会治理范式的结构性穷尽,更宣告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想象力的彻底枯竭。这在呈现西方话语虚伪性的同时,也为非西方社会打开一个理论空间。既然西方模式并非不可超越的终点,那么立足于不同历史条件的替代性路径便具有了充分的理论正当性。

西方福利危机在根本上还是“人的异化”危机。当资本逻辑主导社会保障时,人被系统性地降格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劳动力市场的原材料,乃至阿甘本意义上直面市场暴力的“赤裸生命”。从“第三条道路”要求劳动者成为“自我企业家”,到保守主义以道德话语惩罚贫困者,这一系列机制的共同指向是,人的价值被彻底还原为其市场可变现性,“人的现代化”蜕变为“人力资本的现代化”。这是对现代性解放承诺的根本背叛。在现实层面上,西方福利国家深陷条件化、惩罚性与排外化的泥淖,为当代全球发展格局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反面启示。面对资本的极致灵活性与社会保护机制的根本龃龉,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巨轮正无可避免地滑向全面瘫痪。这一历史性溃败深刻表明,依附于中心国家资本积累逻辑的社会保障模式已走入死胡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西方福利模式绝非可供线性移植的现代性标杆。打破西方在此领域的理论垄断,剥离其转嫁危机的虚伪道德外衣,正是在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基础上,真正树立起立足于广大非西方世界、自主建构新型包容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自觉,并开启这一实践探索的历史进程。

正是在这一对照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人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价值才得以凸显。西方福利国家深陷“资本逻辑”与“社会契约”博弈的制度困境,无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建构提供了极其深刻的负面镜鉴。面对后发赶超与全球化震荡的双重压力,中国式现代化明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国家、市场与公民关系时,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人民至上”的逻辑坚决超越西方“资本至上”的底层逻辑;在有效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积极作用的同时,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逻辑对社会公共领域与基本民生底线的反噬。我们要探索出一条既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又能促进实质性公平正义的新型包容性社会保障之路。这意味着,人的现代化不能被简化为人均GDP的增长或福利支出的扩张,而是要在制度设计上始终坚守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将社会保障确立为保障每个具体的人有尊严地生存、自主地发展的制度前提,而非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润滑剂或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这一价值立场,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发展道路的深层依据,也是为全球南方寻求替代性社会治理模式提供的最根本理论参照。

The Contestation Between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A Critique of the Ideologies of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s

XIE Jing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other major ideologies within contemporary Western welfare states clearly reveals how the logic of capital transforms its own accumulated crises into a systematic dismantling of the post-war universal social contract. In this process, neoliberalism, through its fundamental negat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shifts the costs and risk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onto individuals, creating a privatization of risks. Conservatism interprets structural poverty as a moral defect of the individual, thereby driving welfare toward punitive, conditional discipline. While the “Third Way”, employing the rhetoric of “social investment”, demands that workers become “entrepreneurs of the self”, thereby completing the comprehensive commodification and governmentalizatio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lastly, right-wing populism, leveraging identity politics, turns internal deprivation into a struggle over resources among ethnic groups, constructing an exclusionary model of “welfare chauvinism”. Together, these four ideologies form a closed loop in which discursive renewal masks structural continuity, pushing the welfare states toward conditional, punitive, and exclusionary outcomes, ultimately plunging them into a severe institutional paralysis. This crisis is not mere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but also a crisis of alienation that reduces “the human being” to a “market factor”. The deep logic of this crisis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edicament of Western governance paradigms but also provides a profound negative lesson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one that transcends “capital supremacy”, upholds “people supremacy”, and explores a new, inclusi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welfare states; the logic of capital; ideological critiqu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social contract

(责任编辑:傅 游)